

#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我国社会的矛盾研究

□潘云成

[安徽大学 合肥 230039]

**[摘要]**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我国社会存在各种矛盾。这些矛盾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呈现出广泛性、复杂性、多重性、长期性等主要特点。各种矛盾的互相交织和相互影响,使这一时期的我国政局变得动荡不安,也引发了频繁和密集的内外冲突与战争,同时也使中日民族矛盾由此上升并最终成为制约和影响我国国内的其他社会矛盾的主要矛盾。

**[关键词]** 土地革命战争; 社会矛盾; 主要矛盾; 内部矛盾; 矛盾普遍性; 矛盾特殊性; 矛盾解决  
**[中图分类号]**K26 **[文献标识码]**A **[DOI]**10.14071/j.1008-8105(2015)03-0064-08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1927年8月~1937年7月),我国社会存在各种矛盾,既有内部矛盾、阶级矛盾,又有民族矛盾。这些矛盾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呈现出广泛性、复杂性、多重性、长期性等主要特点。各种矛盾的互相交织和相互影响,使这一时期的我国政局变得动荡不安,也引发了频繁和密集的内外冲突与战争,同时也使中日民族矛盾由此上升并最终成为制约和影响我国国内其他社会矛盾的主要矛盾。

## 一、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我国社会存在的矛盾

(一)内部矛盾:主要有国民党新军阀与北洋军阀的矛盾、国民党内部的矛盾、中国共产党内部的矛盾

### 1. 国民党新军阀与北洋军阀之间的矛盾

“四·一二”政变后,全国形成了南京、武汉、北京三个政权对峙的局面。宁汉合流后,以蒋、冯、阎、桂为代表的国民党新军阀与以张作霖为代表的北洋军阀的矛盾变得尖锐起来。为了共同利益,蒋、冯、阎、桂为代表的国民党新军阀暂时取得妥协,决定组织北伐军,共同出师北伐,消灭北洋军阀势力,以便统一全国<sup>[1]</sup>。1928年4月7日,北伐正式开始。5月中下旬,北伐军相继攻占石家庄、德州、归绥、大同、张家口、保定,直逼北京、天津。在败

局已定的形势下,张作霖决定实行总退却。6月4日,日本关东军制造了“皇姑屯事件”,张作霖在沈阳近郊皇姑屯被日本人炸成重伤,不久死去。国恨家仇,使张作霖之子张学良不顾日本帝国主义的阻挠,毅然于1928年12月29日发表《易帜通电》,宣告东北三省“于即日起宣布,遵守三民主义,服从国民政府,改易旗帜”<sup>[2]</sup>。至此,南京政府在名义上统一了全国。

### 2. 国民党内部的矛盾

国民党自组党之日起,就是一个组织成分极其复杂、党内派系纷繁众多的政党,其内部一开始就存在着一定的矛盾和斗争。至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国民党掌控了中央政权后,其内部的各派系之间、中央军阀与地方实力派之间的矛盾斗争不但没有停息,反而在一定时期内达到白热化的程度。前者主要是关于国民党“正统”之争,主要争夺对全国的统治权,如宁汉对立(导致蒋介石第一次下野)、宁粤对立(导致蒋介石第二次下野);后者主要是限制与反限制、消灭与反消灭的斗争<sup>[3]</sup>,为此,爆发了蒋桂战争、蒋冯战争、蒋唐战争、蒋冯阎桂中原大战。

### 3. 中国共产党内部的矛盾

主要表现为三次“左倾”路线,特别是王明路线给中国革命事业造成很大损失;各区的肃反,如中央苏区肃AB团,鄂豫皖区、湘鄂西区、闽西区肃改组派、社会民主党等,都犯了扩大化的错误,而以张国焘统治的鄂豫皖最严重,错杀了许多优秀干

[收稿日期] 2014-05-07

[基金项目] 安徽大学研究生学术创新研究项目资助课题“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我国社会的矛盾研究”(yfc100166)。

[作者简介] 潘云成(1970-)男,安徽大学历史系中国史专业博士研究生。

部,造成惨重损失。在长征中,张国焘个人野心急剧膨胀,反对党中央的政治路线和红军北上抗日的战略方针,坚持其向川康边界少数民族地区退却的右倾分裂主义,还企图以武力阻拦中共中央北上,并妄图篡夺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权,党中央对其分裂党、分裂红军的错误进行了坚决地斗争。

(二) 阶级矛盾: 国民党蒋介石与中国共产党的矛盾

国民党蒋介石始终视中国共产党为其心腹大患,实行“清党灭共”政策,残酷地镇压中国共产党人,以实现其一党专政的目的。为了彻底消灭中国共产党,在军事上,国民党在结束了中原大战后,立即把军队的主力调到“剿共”前线,先后五次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苏区实行“围剿”。中国共产党则在大革命失败后,重新举起革命的旗帜,发动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等多次起义,并在农村开辟革命根据地,建立了新型的人民政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与国民党政权形成对峙局面,用武装斗争来反抗国民党的镇压。

(三) 民族矛盾: 主要是中国和日本之间的矛盾(中外矛盾)

1928年日本制造了“济南惨案”和“皇姑屯事件”,中日民族矛盾在一些地区开始激化。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以变中国为其独占殖民地为目的的严重事件——“九·一八”事变。事变发生后,广大工人、农民、学生、工商业者和城市各阶层人民,迅速掀起了抗日斗争的怒潮。在中日民族矛盾急剧上升的情况下,1935年“华北事变”后,中日民族矛盾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

## 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我国社会矛盾的主要特点

(一) 矛盾的广泛性、复杂性和多重性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我国社会存在诸多矛盾,具有广泛性特点。这些矛盾既有内部矛盾(主要有国民党新军阀与北洋军阀的矛盾、国民党内部的矛盾、中国共产党内部的矛盾)、阶级矛盾(主要是以国民党蒋介石为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统治与以中国共产党为代表的人民大众之间的矛盾),还有民族矛盾(主要是中国和日本之间的矛盾)。除了具有广泛性这一特点外,由于我国社会的各种矛盾错综复杂地相互交织在一起,又具有复杂性和多重性特点。例如在国民党内部矛盾中,不仅存在着派系矛

盾,而且大部分派系内部又存在着派系矛盾。蒋系、冯系、桂系、阎系、东北系之间存在着矛盾,而在阎系内部又存在着五台籍和非五台籍之间的矛盾,东北系内存在着少壮派与元老派之间的矛盾。蒋介石的嫡系内部,CC系、黄埔系以及新政学系之间存在着矛盾斗争,而在黄埔系内部,陈诚的“土木系”与何应钦派之间也存在着尖锐的矛盾斗争。当1935年“华北事变”后,中日民族矛盾日益尖锐并上升为社会的主要矛盾时,国民党内部存在抗日派与投降派之矛盾。抗日派能够与中国共产党合作,而投降派却仍坚持反共。“在抗日派内部又存在如何抗日之争,即要不要发动民众,要不要实行民主、改善民生,要不要实行宪政,等等争执。”<sup>[47]</sup>

(二) 矛盾的长期性

突出表现在国共矛盾、国民党内部的矛盾这两对矛盾在这一时期相当长的时间内存在着。从1927年国共分裂后,国共对峙的局面开始出现。从1930年10月至1934年10月,国民党对中共武装发动五次大规模的“军事围剿”,最终把中共武装驱至西北。“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国共之间的矛盾并没有因日本的入侵而缓解。毛泽东说:“对外抗战,没有国内和平和两党合作这是做不到的。”<sup>[5]</sup>面对日本入侵的严重局势,国民党蒋介石仍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和对日妥协政策,对中共领导的红军和苏区加紧实行“军事围剿”。再加上中共当时受王明“左”倾错误路线指导,国共双方都在事实上坚持消灭对方,这就使得国共矛盾更加尖锐。华北事变后,国共虽然开始接触,但是由于蒋介石缺乏诚意,致使双方和平谈判陷入僵局,国共关系没有任何改善。1936年下半年,中共以民族利益为重,首先主动放弃“反蒋”口号,制定了“逼蒋抗日”方针。但由于蒋介石还没有放弃“剿灭”共产党的政策,所以,国共关系实质上仍是尖锐对立的<sup>[6][10]</sup>。直到“西安事变”发生后,通过谈判,蒋介石被迫答应联共抗日,国共矛盾开始趋向缓和。

国民党内部派系众多,成分复杂,从成立时其内部就存在着矛盾斗争,到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内部的矛盾斗争更是日趋激烈。“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内部的矛盾斗争继续存在,激烈冲突时有爆发。“九·一八”事变发生时,正值宁粤对立,在粤方的坚持要求下,蒋介石曾被迫下野。其后几年,发生了察哈尔抗日同盟军“抗日反蒋”、“福建事变”、“两广事变”。“西安事变”后,国民党内部的矛盾才真正得以缓解。

### (三) 主要矛盾的变化性和阶段性

在这一时期不同的历史阶段,随着各种社会政治势力的此消彼长,主要矛盾也随之发生变化。

1927年8月至1928年6月,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突出地表现为国民党新军阀与北洋军阀的矛盾。汪精卫发动“七·一五”反共政变之后,宁、汉双方协商合流,汉方提出合流的条件之一是蒋介石必须下野<sup>[7]</sup>。蒋介石在汉方的坚持和宁方内部桂系的逼迫下,以退为进,宣布下野。这样,宁汉实现了合流。但是,合流后的国民党内部很快又因分赃不均而争斗起来,并一度爆发了战争。北洋军阀孙传芳乘机进攻南京。此时,已加入国民党的冯玉祥、阎锡山要求国民党精诚团结,共同对付北洋军阀。蒋介石乘机在协调各方关系的局面中重新上台,于1928年2月召开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成立各派统一的国民政府。接着,组成以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分任总司令的第一、二、三、四集团军,共同北伐。5月1日攻下济南,6月上旬进占北京,北洋军阀政府随之被推翻。

1928年6月至1930年10月,国民党新军阀同北洋军阀的矛盾基本结束后,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立即转变为国民党新军阀内部的斗争。虽然中国共产党人在国民党右派背叛国民革命后走上了武装反抗国民党统治的道路,但是国民党各派并没有立即携起手来对付共产党,因此在这一阶段,我国社会主要表现为国民党新军阀内部的混战,主要爆发了蒋桂之战、第二次蒋桂之战、蒋冯战争、中原大战。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国民党新军阀蒋桂冯阎四派,在北京天津没有打下以前,有一个对张作霖的临时的团结。北京天津打下以后,这个团结立即解散,变为四派内部激烈斗争的局面。”<sup>[8][47]</sup>

1930年10月至1935年“华北事变”,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表现为国共两党之间的矛盾。从1927年下半年开始,中共党人先后发动了一系列起义,开辟了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但是,国民党并没有把主要精力用来对付工农红军,而是忙于内部斗争,只是用一些当地军阀进攻红军。但从1930年10月中原大战结束后,国共矛盾开始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1930年11月起,蒋介石调集国民党军队向中央苏区先后发动了五次大规模的军事“围剿”,红军英勇奋战,粉碎了国民党军的前四次“围剿”。在第五次反“围剿”中,由于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占据中央领导地位,致使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被迫进行长征。在长征途中,

蒋介石调集军队对红军进行围追堵截。在国民党发动反共军事“围剿”的同时,日本发动了“九·一八”事变。此时蒋介石认为日本是皮肤之患,而工农红军才是心腹之患,因而对日军的进攻采取不抵抗主义,宣布把“攘外必先安内”作为基本国策,继续对红军进行“围剿”。直到1935年,日本制造“华北事变”,中日矛盾进一步激化,国共矛盾降到次要地位。

1935年“华北事变”至1937年7月,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表现为中日民族矛盾。1935年,日本制造“华北事变”,其侵略行径已经严重危及到了中国各阶级阶层的生存和发展,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无论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无论是地方实力派,还是其他政治派别,都把抗日救亡作为自己首要的政治主题。”<sup>[6][16]</sup>国共双方开始了公开的正式谈判,共同商量联合抗日事宜;“地方实力派和其他政治派别也以民族大义为重,修正了自己过去的一些做法和观点,真正回到了拥护全国团结、共同抗日的立场上。”<sup>[6][16]</sup>

### (四) 矛盾的解决方式和手段的多样性

#### 1. 用武力解决

国民党内部的矛盾大都诉诸武力解决,如蒋桂战争、蒋冯战争、蒋唐石战争和蒋阎冯桂中原大战。这些战争均以蒋介石的胜利而告结束。经过这几次新军阀混战,特别是经过中原大战,国民党各派军阀间的力量对比发生了很大变化。冯玉祥失去了自己的地盘和军队,冯系被彻底分化瓦解而不复存在。晋系战败后,元气大伤,势力被局限于山西、绥远,无力同蒋介石争夺中央大权。其他诸如桂系等实力也大受损伤。中原大战的胜利,不仅使蒋介石取得权力分配的优势地位,而且还使他在此后较长的时间内没有别的军事力量与其较量,这就使他的独裁统治得以巩固。此后的一段时间,虽然反蒋势力仍然存在,派系争斗还不断发生,但国民党的统治基本上稳定下来。这也使蒋介石能够腾出手来,在消灭了地方军阀势力后,开始集中兵力加强对工农红军和苏维埃革命根据地的“军事围剿”。

#### 2. 军事手段和政治手段相结合

国共矛盾斗争中,蒋介石在解决国共矛盾时,除了采用军事“围剿”的手段外,有时还采用军事“围剿”和政治解决相结合的手段。如在第四次对红军进行“围剿”时,便采用此手段。《上海停战协定》签订后,1932年6月下旬,蒋介石调集兵力向中共各根据地发动了第四次军事“围剿”。在此次围剿

中,蒋介石确定进攻红军的“方略”要“军事与政治并重”,实行“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反共方针<sup>[9]234</sup>。蒋介石认识到,对付红军单纯采取军事手段是不行的。国民党人早在第一次“围剿”失利后就发现:“匪区民众,久受赤化,所得我方消息,即行转告匪军。”<sup>[10]</sup>这时国民党人已经认识到与共产党争夺农民的必要性,承认:“现匪军之所谓战斗员,苏区农民,几占十分之七八,彼等皆被伪政府所欺骗利诱,即每人或分有田地,或惑于所谓‘红军眷属优待条例’,故在匪军中较为坚决可靠。”<sup>[11]389</sup>据此,蒋介石开始明确地提出“剿匪”必须实行“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方针。因为“军队与政治、社会、经济是密切相关,而不容分割的”,“我们一方面要发挥军事的力量,来摧毁土匪的武力;一方面更加加倍地运用种种方法,积极地来摧毁土匪所有的组织,及在民众中一切潜力,尤其是匪化的心理,更应设法变更。故须积极地组织并武装民众以树立我们在民众中实质的基础,尤其是要教化一般民众,使他们能倾向我们的主义,以巩固我们在民众中精神的壁垒”<sup>[11]389-390</sup>。

### 3. 用和平手段解决

例如“两广事变”的解决就是采用了和平手段。“两广事变”是在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的情况下,国民党营垒中的一次分化,反映了国民党内部的矛盾,即地方实力派与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中央的矛盾。1932年年初,国民党西南执行部和西南政务委员会成立后,两广一直呈半独立状态。1936年5月12日,主张反蒋抗日的实力派胡汉民在广州逝世,两广地方实力派失去了重心。蒋介石决定利用这个机会解决两广问题,提出要取消西南执行部和西南政务委员会,要求广东的陈济棠把广东的军政大权交还南京国民政府。于是,陈济棠先发制人,联合广西地方势力李宗仁、白崇禧,打起“抗日救国”的旗号,举兵反对蒋介石。“两广事变”发生后,蒋介石迅速调集军队准备用武力解决。后来由于全国舆论纷纷反对内战,事变遂告和平解决。

## 三、各种矛盾之间的内在联系及其影响

(一) 国民党新军阀与北洋军阀的矛盾,使国民党内部各派军阀为了共同利益暂时取得妥协,共同北伐,国民党内部的矛盾由此得到缓解,但却使中日矛盾在一些地区开始激化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在北方,以奉系军阀张作霖为代表的北洋政府与之对峙。为了共同利益,

蒋、冯、阎、桂各派军阀暂时取得妥协,决定北伐,推翻北洋军阀在北方的统治,从而统一全国。此举使国民党新军阀内部的矛盾得到了缓解,但南京政府统一全国和国民党军的北伐,同日本帝国主义分裂中国以便进一步霸占中国的野心发生了尖锐矛盾。日本为阻止国民党军的北伐,决定出兵山东,并于1928年5月制造了“济南惨案”。“济南惨案”使中日矛盾开始激化。

本来,在很长时间内,日本与张作霖之间保持着一种相互利用和依存的关系。张作霖依靠日本的支持维护自己的统治;日本利用张作霖扩大其在东北的权益。在国民党军二次北伐大举进兵后,日本政府企图继续利用张作霖实现其扩张侵华权益的意图。但日本与张作霖在相互利用的过程中,两者之间的矛盾也在发展。张作霖本来是日本扶植起来的,但他后来发现日本有独吞东北的野心,因此,他在继续依赖日本的同时,开始与西方国家交往,以抵制日本。他在国民党军大举进攻下被迫北撤时,已与南京政府秘密约定在三个月内改旗易帜,归属南京政府。日本关东军认为张作霖已经失去了利用的价值,于是制造了“皇姑屯事件”。“皇姑屯事件”加深了张作霖之子张学良与日本之间的矛盾,从而推动他不顾日本的阻挠而实现与南京方面的统一。

(二) 国民党内部的矛盾——地方实力派与蒋介石中央政府之间的长期矛盾斗争,消耗了进攻红军的力量,客观上为红军和红区的发展壮大,为红军长征的胜利创造了有利时机,使中国共产党在国共矛盾斗争中有时处于有利的地位

地方实力派与蒋介石中央政府之间的矛盾斗争,使国民党不得不把主要精力用于解决两者之间的矛盾上面,这就为红军和红区的发展壮大提供了有利时机。从1927年到1930年,中共利用国民党军阀之间连年不断的内战所造成的形势,开展土地革命,武装割据,建立了工农红军和革命根据地,力量不断壮大。例如1929年初蒋桂战争期间,毛泽东、朱德乘国民党忙于派系间的战争,率红军在赣南、闽西地区建立了革命根据地。1930年,乘国民党集中兵力于中原大战,红军和苏区得到大发展<sup>[4]16</sup>。

从1916年反袁护国战争结束以后,在粤、桂、湘、赣、川西南六省,逐渐形成一些拥兵自重、割据一方的地方军阀。这些地方军阀表面上服从蒋介石中央政府,但实际上却与中央政府存在“离心”倾向。蒋介石对这些地方军阀采取“既笼络又排斥消灭”的政策,这就使得地方军阀与蒋介石中央政

府不可避免地产生了矛盾。在长征中,红军正是巧妙地利用两者之间的矛盾冲突,打破了他们的围追堵截,使红军能够胜利地实现战略转移,使红军的力量得以保存。例如广东军阀陈济棠为了对抗蒋介石,从消极“剿共”演变为与红军订立秘密协议,从而使后来长征的红军能够顺利地通过第一、二道封锁线。又如,当红军途径广西时,国民党桂系为了保存自身的实力,没有与红军激战,而是为自保而“让道”给红军,红军得以顺利越过桂境。“红军充分利用蒋介石与地方军阀之间的矛盾,并运用正确的策略,也是红军长征胜利的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sup>[12]</sup>

(三) 中国共产党的内部矛盾,使国民党在国共矛盾斗争中有时处于优势地位

三次“左”倾路线,特别是王明“左”倾路线,给革命事业带来巨大损失。1931年1月,中共中央召开六届四中全会,从苏联回国的王明等人在共产国际的支持下,推行一条比瞿秋白、李立三更“左”的左倾路线。王明等人认为由于“九·一八”事变的爆发和第三次反“围剿”的胜利,革命时机已经成熟,苏区党和红军的任务就是要“更坚决的更彻底的执行国际与中央的一切指示,更深刻的发展苏区内部的阶级斗争”,并“集中力量追击敌人,取得一两个中心的和次要的城市”<sup>[13]</sup>。强调“全线出击”、“夺取中心城市”,强调“御敌于国门之外”,“不丧失寸土”。毛泽东不同意王明等人的错误观点,既反对冒险攻打大城市,也反对根据地扩大阶级斗争。这样一来,他被机会主义者诬蔑为“保守”、“退却”、“狭隘经验主义”、“右倾机会主义”。1931年底,被剥夺了在苏区红军中的领导地位,不断受到批判。一些同意毛泽东正确意见的党政军干部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批判和打击。毛泽东被排挤出军事领导核心以后,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和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掌握了中央军事指挥权,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先是主张冒险进攻,企图将“围剿”之敌歼灭或阻挡在中央根据地之外,在付出重大代价仍不能达到目的之后,遂退入根据地,实行消极防御。在强敌压迫下,红军丧失主动,节节抵抗,节节败退,伤亡惨重。红军打破敌人第五次“围剿”已不可能,不得不进行战略转移,进行长征。

各根据地开展的肃反活动,加剧了共产党内部的矛盾,使革命元气大伤。国共两党之间的矛盾斗争是尖锐和复杂的。国民党为了消灭共产党,不但在军事上发动“围剿”,在政治上思想上展开进攻,

而且派遣人员打入共产党和根据地内部,进行各种破坏活动。由于斗争的尖锐复杂,从1930年开始,共产党在各根据地开展肃反斗争。在王明路线统治党中央时期,肃反达到高潮。但是,当时中共中央和各地共产党组织对内部敌情的估计都过于严重,在肃反中又大搞逼供,再加上某些掌握肃反权利的人品质低下,借肃反来消除异己,结果,各个苏区的肃反都犯了扩大化的错误,成千上万的红军指战员,根据地领导人和普通共产党员、群众被杀害。肃反活动使革命元气大大损伤。

张国焘与党中央的矛盾,使革命遭受严重挫折。在长征途中,1935年6月,中共中央确定了发起松潘战役、北上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的方针。但中共中央率中央红军北进时,张国焘却扬言要“审查中央路线”,他借口“统一指挥”和“组织问题未解决”,故意拖延红四方面军的行动。由于张国焘的拖延,红四方面军主力迟迟未能北上,耽误了1个多月时间,给了蒋介石以充分的调兵遣将堵截红军东出北上的机会,使红军丧失了松潘战役的有利时机。在“北上”和“南下”之争中,张国焘坚持南下,拒绝执行中央北上战略方针,致使南下的红军在百丈地区与四川军阀刘湘的军队激战时虽歼灭1.5万人,但自己却损失近万人。至1936年3月,“红四方面军已减员至4万余人”<sup>[14]</sup>。

共产党内部矛盾的存在,还使中共失去了利用国民党内部矛盾削弱国民党军队对苏区的进攻力量的重要机会。1933年冬福建发生了以第19路军为骨干,联合第三党等势力,发动的抗日反蒋事变——“福建事变”,此事变是国民党内部矛盾的反映。蒋介石被迫抽调进攻红军的主力前去镇压,从而牵制了蒋介石“围剿”红军的力量。此时,毛泽东提出,“红军应乘机突进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赣地区,纵横驰骋于杭州、苏州、南京、芜湖、南昌、福州之间,将战略防御转变为战略进攻,威胁敌之重地,向广大无堡垒地带寻求作战。”<sup>[15]</sup><sup>[237]</sup>这能迫使进攻中央根据地之敌回援,既可以粉碎敌人的进攻,又可以援助福建人民政府。但由于当时中共党内王明“左”倾机会主义占据统治地位,没有采纳毛泽东的正确意见,不但不支持与第19路军的真诚合作,及时支援福建人民政府,相反还把“福建事变”看成是便利红军和根据地扩张的一种有力的形势,试图乘人之危,让红军“假装帮助十九路军”,实则“堵住十九路军入粤去路”,“使我争取其最大部分群众和武装”,借机扩大根据地和红军<sup>[11]</sup><sup>[303]</sup>。结果,蒋介石

石在打败福建人民政府后,又集中全力继续从北路和东路进攻红军,红军由此失去了粉碎国民党第五次“围剿”的一个极为有利的时机。

(四)国民党坚持“攘外必先安内”政策,使国共冲突加剧,再加上国民党内部矛盾的存在,从而给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以可乘之机

“九·一八”事变前,中国的政治局势已极不稳定,突出的表现在:由于国民党坚持“攘外必先安内”政策,使国共冲突加剧,国共两党在政治上、军事上、文化上展开了搏杀;国民党内部的矛盾——国民党各政治派别之间,中央政府与地方实力派之间,蒋、冯、阎、桂等军阀集团之间,地方军阀与地方军阀之间的政治较量不断,军事争斗不已。日本帝国主义正是利用了这一极为有利的时机发动了“九·一八”事变,侵占了东北三省。

(五)国民党对内执行武力“剿共”政策,使其把主要军事力量用来“剿共”,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国防力量,为日本帝国主义在中日矛盾斗争中逐步加深和扩大对中国的侵略,谋取了越来越多的侵略权益

由于对内执行武力“剿共”政策的需要,国民党把主要军事力量用来“剿共”。“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蒋介石将共产党视为抗日的障碍,动员了较大部分的人力、军力和财力来实施“剿共”。以军力而言,1932年夏对苏区进行“围剿”的军队达63万;1933年9月开始的对苏区的“围剿”投入军队达100万<sup>[15]</sup>。以财力而言,1934年~1936年的三年是国民政府竭力“剿共”的年份,其军费开支连续居高不下。据政府公开发表的财政统计,这三年的军费支出分别为38660万元、36200万元和55520万元。据专家分析还有部分军费在其他非军事项目下支出,总军费的支出实数在财政总支出中所占份额“大致不会在百分之四十几以下”<sup>[16]</sup>。以如此巨大的军力和财力去从事“剿共”,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国防力量,使国民政府没有力量去对付日本的侵略扩张。国民党蒋介石为了“安内”,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对日本的侵略挑衅妥协退让。“而日本帝国主义也正是利用蒋介石政府把重要力量用于内战之机,一步一步地加深和扩大对中国的侵略,谋取了越来越多的侵略权益。”<sup>[17]</sup>

(六)在中日民族矛盾日益尖锐化的情况下,国民党内部的矛盾斗争成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的催化剂

“九·一八”事变后,围绕对“九·一八”事变的态度问题,国民党内部矛盾迅速激化。国民党

的主战派坚持反对妥协派的斗争,反对南京国民党中央的内政外交政策。1931年10月,黑龙江省主席兼东北边防军驻黑省副司令马占山拒绝执行蒋介石“不抵抗”命令,毅然率部抵抗日军进攻,组织了著名的嫩江桥抗战。1933年5月,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下,冯玉祥联合吉鸿昌、方振武组织察哈尔抗日同盟军,举起“抗日反蒋”的旗帜。同年11月,李济深、陈铭枢、蔡廷锴、蒋光鼐等人发动的“福建事变”,则是“国民党营垒的破裂”,是“国民党内部矛盾的表面化”<sup>[18]</sup>。胡汉民、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等两广领袖人物,对南京中央政府对日妥协政策进行了猛烈抨击,并打出“反蒋抗日”旗号,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迫使蒋介石改变其政策。张学良、杨虎城与蒋介石的矛盾,最终导致了“西安事变”的发生,直接加速并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初步建立。

(七)中日矛盾成为主要矛盾时,国共矛盾降到次要地位,促使国共再次合作,共同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

1935年的“华北事变”后,中日民族矛盾成为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国共两党阶级矛盾降到次要地位。“西安事变”后,国共两党及其所代表的阶级间的关系由过去尖锐对立真正走向缓和与联合。通过“西安事变”,蒋介石被迫答应放弃武力解决中共问题,共产党也承认愿意放弃武力推翻蒋介石国民党。“西安事变”后蒋介石回到南京,国民党中央及南京国民政府正式下令停止进攻工农红军和苏区;中共也发表宣言,宣布“五项要求四项保证”,公开承诺放弃武装推翻国民党蒋介石及南京国民政府<sup>[17]</sup>。国共再次合作,共赴国难。

#### 四、结束语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我国社会存在各种矛盾。这些矛盾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相互影响,使这一时期的政局变得动荡不安,也引发了频繁和密集的内外冲突与战争。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蒋介石排除异己,实施独裁统治,国民党内部各派系之间为争夺最高统治权或地方权力进行了反复的争斗和较量,使矛盾日趋激化。而此时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红军在国民党内部矛盾冲突日趋激烈的背景下乘势兴起并得到极大的发展。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红军力量的逐渐强大,成为国民党蒋介石的心腹之患。在这种社会政治背景下,蒋介石实施“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对红军进行大规模的“围剿”,

其结果造成国内继续分化,民心不一,政局动荡。中国国内的这种不稳定政治局势,给了日本帝国主义入侵中国以可乘之机。1931年日本制造“九·一八”事变,中日民族矛盾由此上升并激化。随着日本侵华加剧,1935年日本制造“华北事变”,中日民族矛盾开始成为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并制约和影响国内阶级矛盾和其他矛盾。这个时期,尽管国民党内部各派系矛盾重重,共产党内部也存有矛盾,但这些都是局部范围内的矛盾和斗争,只是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主要矛盾的次要矛盾。1936年12月,反映国民党内部矛盾的重大事件——“西安事变”的发生,使中国的政局出现重大的历史转折。随着“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国共开始了长时间的曲折接触和艰苦谈判,国共矛盾最终以政治方法得以解决,国共两党之间的关系真正走向缓和。双方再次携起手来,共同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

毛泽东在《矛盾论》中指出:“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的发展过程中”;“每一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存在着自始至终的矛盾运动”;“没有什么事物是不包含矛盾的,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sup>[8]305</sup>。事物就是在矛盾的不断产生又不断解决的过程中得到发展的。我们的改革开放,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也是在矛盾的不断产生和解决过程中前进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由于实行了改革开放政策,我国经济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和文化生活水平不断提高,解决了长期以来没有得到解决的许多社会矛盾,其中包括许多人民内部矛盾。但是,在这同时,也使原来的一些人民内部矛盾更加突出地显现出来,并产生了许多新的人民内部矛盾。所以,我们必须坚持和发展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有关矛盾学说,正确认识和处理现阶段的人民内部矛盾。首先,要实事求是看待矛盾,承认矛盾的存在,要敢于正视矛盾,努力解决矛盾。其次,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应注意对不同的情况作具体分析,掌握不同事物的矛盾特殊性。从实际出发,用不同的方法解决不同的矛盾。马克思主义的矛盾论认为,矛盾的复杂性和特殊性决定了矛盾解决的形式也是多种多样的。因此我们要增强解决矛盾的针对性,不同类型的矛盾要采取不同的方法解决。例如,属于思想性质的矛盾,要重在思想教育,把人们各种不同的思想认识统一到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上来;属于利益问题引起的矛盾,要以公平正義理念为指导积极理顺分配关系,并充分发挥政策的引导作用和制度的保证作用。属于体制机制造成

的矛盾,要通过改革的办法来解决。再次,要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处理当前人民内部矛盾。发展是硬道理,是解决中国所有问题的关键,发展也是唯物辩证法在解决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中的具体运用。毛泽东指出,“在复杂的事物的发展过程中,有许多矛盾存在,其中必有一种是主要的矛盾,由于它的存在和发展规定或影响着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sup>[8]320</sup>。“抓住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sup>[8]322</sup>。我国社会面临的主要矛盾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解决这个主要矛盾的根本办法就是发展。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是发展,所以必须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首先在发展中解决当前的人民内部矛盾。必须始终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最后,要大力推进改革开放。改革开放是强国之路,也是解决新形势下人民内部矛盾的根本方法。当前,人民内部的许多矛盾和问题,既有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不高的原因,又有体制机制方面的原因。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是解决这些矛盾和问题的根本方法。

## 参考文献

- [1] 潘云成.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我国社会的各种矛盾及其表现[J]. 重庆理工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4, 28(6): 80-84.
- [2] 毕万闻. 张学良文集[M]. 北京: 新华出版社, 1992: 150.
- [3] 马小芳. 中国共产党与阎锡山集团统一战线研究[M]. 北京: 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5: 19-20.
- [4] 郭绪印. 国民党派系斗争史[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2.
- [5] 毛泽东选集: 第2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1: 365.
- [6] 张国镛, 陈一容. 为了忘却的纪念——中国抗战重庆历史地位研究[M]. 重庆: 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
- [7] 许庆朴, 张福记. 近现代中国社会: 上册[M]. 济南: 齐鲁书社, 2002: 292.
- [8] 毛泽东选集: 第1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1.
- [9] 张宪文. 中华民国史: 第2卷[M].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 [10] 关于第一次赣南围剿之经过情形[G]//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 第5辑第1编. 南京: 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8: 50.

[11] 杨奎松. 中国近代通史: 第8卷[M]. 南京: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9.

[12] 聂资鲁. 国民党大陆失败论——对一个执政党迅速衰败的法哲学与政治哲学剖析[M]. 贵阳: 贵州人民出版社, 2004: 191.

[13] 由于工农红军冲破第三次围剿及革命危机逐渐成熟而产生的党的紧急任务[Z]//中央档案馆编.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 第7册. 北京: 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1: 437.

[14] 鲁振祥, 陈绍畴, 郭飞平. 20世纪的中国: 内争外

患的交错[M]. 郑州: 河南人民出版社, 1996: 353.

[15] 彭敦文. 国民政府对日政策及其变化——从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7: 310.

[16] 杨荫溥. 民国财政史[M]. 北京: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1985: 70-71.

[17] 郭贵儒. 从繁盛到衰败——大陆时期的中国国民党[M]. 北京: 华文出版社, 1999: 182.

[18] 彭德怀. 彭德怀自述[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1: 184.

## Study on Our Country's Social Conflicts in the Period of Agrarian Revolutionary War

PAN Yun-cheng

(Anhui University Hefei 230039 China)

**Abstract** In the period of Agrarian Revolutionary War, there are various conflicts in society of our country. These conflicts mingled complicatedly and confusedly and presented main features such as extensiveness, complexity, multiplication, and long-term existence. Various conflicts mingled and affected with each other made political situation of this period of our country become unsettled, and also caused the frequent and intense internal and external conflict and war. In the meanwhile, the national contradiction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started to rise and finally it became the restriction and influence of the principal conflict of other internal social conflicts in our country.

**Key words** period of Agrarian Revolutionary War; social conflict; main conflict; internal conflict; universality of conflict; particularity of conflict; solution of conflict

编辑 张 莉

(上接第63页)

## Exploration to Utopian Socialism Saint-Simon's New Philosophy

SHI Shao-bo

(Xidian University Xi'an 710126 China)

**Abstract** The French utopian socialism Saint-Simon devoted his life to seek the social science theory from the practical point of view, and used philosophy to promote the formation of industrial and scientific system, striving for the happiness of mankind. When Saint-Simon was forty-two years old, he proposed to establish a new philosophy. The law of social development thoughts is the basic core of Saint-Simon's new philosophy system. He emphasized that the determinism is the philosophy guiding principle of scientific methodology, provided the main task of philosophers, and prospected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society. To some extent, Saint-Simon's new philosophy is close to historical materialism and materialistic principle, which is Saint-Simon's biggest contribution. Saint-Simon not only provided theoretical basis for the Marx's theory of scientific socialism, but also provided the basis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Marx's philosophy.

**Key words** Saint-Simon; new philosophy; law; empirical; materialism; organizational system

编辑 刘 波